

## 智慧的形状

尚杰

(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

智慧是哲学的“专利”吗？有不属于“哲学”的智慧吗？这样的疑问，乃在于人们对属于哲学的智慧有一种下意识的固有判断，这表现为哲学的语言和文体形式，也在其所用的概念。我们却认为，现实教科书中的，甚至学术著作中的哲学把相当多的智慧筛掉了，只留下枯燥的教条。具体说，哲学筛掉了“智慧的形状”。

哲学概念好比一个“点”。依照逻辑推论，各种这样的“点”相互替代、连接，从而形成一条线。哲学史就是这样一条不中断的线。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史是同一的，所以，哲学家们总要追溯源头，直到古希腊哲人的“爱智”。换句话说，哲学史在哲学上行使明显的镇压职能，哲学的俄狄浦斯：只要你没读过这个或那个，没读过关于这个的那个和关于那个的这个，你就不敢以你的名义讲话（参见德勒兹，2000年，第6页）。这样的观“点”亦是一个观念或立场，西方哲学的智慧是观念的智慧；

哲学史只是告诉我们这些“点”是什么，于是，我们只看重它的结论。但是，更重要的却是智慧“如何”：就此而言，与其说智慧凝聚为一个点，走垂直的方向，不如说智慧为一个又一个断面，沿着横的方向，更像一个“树突”的形状，有一条条岔路，引导我们到非正常的精神状态。

智慧中的岔路，每条路都通向一个立场，但是，如果我们不做选择呢？如果把判断束之高阁呢？这不仅是胡塞尔的智慧，也可以在老庄中寻到它的踪迹：老子描绘智慧的形状像似玄、暗、虚、渊、谷、门、水、柔、无为、静、曲，像似一个女人的心理（害羞）和生理特征（生命之门）；庄子言大智之人形同槁木，心如死灰，隐而不露也。又有如不动声色的庖丁解牛，他所见的并不是眼前的牛，而是不可见的牛的穴窍或空隙。我把它比作牛的命脉，像一条条网络交错的“线”，难以测定的“流”。刀顺着它走，连牛的筋骨都不碰，牛便轰然解体了，而牛刀用了19年还是崭新的。这自然是极高的智慧，却不是（西方）哲学的智慧，后者是智慧中的另一半，我们姑且称为“光明”或“赤露”，像老子书中名、实、有、盈、锐、光、刚、有为、直等等。于是，什么也没有隐藏，也就没有留下智慧周旋的余地。

庖丁解牛的智慧为隐或迂回，与光明赤裸直线型的智慧绝不相同。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称迂回的智慧为哲学的另一面：没有观念的智慧（于连，1998年，第6页）。在这里，他甚至忽视老庄与孔子之间的差别，因为孔子也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篇）——没有占先的观念、先定的必然；不要固执己见，不要一个特殊的我，这与老庄轻视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境界交相于隐，一种被西方哲学抹去痕迹的智慧：这智慧没有野心，宁泊平淡，却导致智慧的另一种可能性。无理性观念之形，对哲学不啻为精神的冒险。不可名状的精神乃哲学思维之剩余、形不成所指的混浊、一片废墟。黑格尔曾把中国精神视为“前哲学”状态，德里达称中国传统中无哲学，但这些，却并非一定是贬义的。

在“智慧”问题上，我并不赞成把中国与西方截然二分。智慧就是智慧，无所谓东方与西方。这里的差别只表现在思考习惯的差别。从这个角度看，于连的态度并不全面：中国智慧并非无观念或概念的，西方智慧亦非全是观念概念的，这里中西智慧呈交错状。如果我们以下谈到两者的差别，只在其思考习惯不同之意义上，并非说其一定永远如此。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这样的差别，而是智慧本身的形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超越这形状。如果以下用一定的篇幅讨论中国古代智慧，那是因为它曾经是智慧形状本身的一部分，而由于（西方）哲学史行使的镇压职能，这“形状”被我们视而不见。

于是，我们不得不从中西不同的思考习惯入手，归结为智慧形状本身。何为“智慧形状”，首先为隐与显之状。在这里，中西思考习惯呈极复杂的情形：我们切不可一般地说中国古代智慧为“隐”，西方智慧为“显”。事实上，隐与显的情形在双方同时存在着。在这里，我们更重视中国智慧“隐”中的“显”和西方智慧中“显”中的“隐”：中国古代智慧是非常讲究形状的，而这形状在西方人眼里是神秘的。中国没有西方一神论的宗教传统，智慧的这些形状就是中国的“宗教”：卦象、以八卦开头的就有八卦图、八卦阵、八卦拳……又有以太极开头的太极图、太极拳……功夫；又有风水、卜、方术；又有甲骨文，“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文心雕龙，原道第一）。观辞、象才可得意。卦与象形文字都是看得见而又神秘的道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仓颉造字，天地惊，鬼神泣。所有这些，皆智慧之形状，为“诡”，或字谜、遁词。中国文“性好隐语……尤巧辞述……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文心雕龙，谐隐第十五）显非本意，乃隐之显，所以为诡，有如兵事，乃诡道也。于是，智慧不独守空，它有看得着的迹象。又现为中国的书画，象在其中，味在其外。倘若去其身体具象，留其影子，还剩下什么呢？或可答曰：道道。卦象、功夫、太极拳、象形文字及其书法……就是这样的轨迹（诡计？），德勒兹所谓线的连接、偏移、滑脱、断裂、散逸（德勒兹，2000年，第7页）。这是智慧之“流”：说话流、笔迹留、身体流，以流对流——这是横向性，犹如书写象形文字的过程：笔划四处泄露，像似条条岔路，妄想的线。这“线”或“流”抵制俄狄浦斯式的精神分析，不可归结为一个统一的点，因为它把看似互不相干的因素对接一起：道道可以异形为字、卦象、画、拳迹……如此等等。这有如“精神分裂”：其智慧形状像德勒兹说的“根状茎”，老树根——没有中心，心神不定，老是走神。

西方智慧的习惯恰恰相反，是从显到隐：所谓本体论，其实为实在论，立足于真，或曰科学。在艺术上则为裸体的传统。这样的智慧要求一揽无遗，不留余地，不要遮盖，故无回味儿。“在场”（presence）的智慧是模仿或表现（re-présenter）的智慧。最高的表现就是形而上学，就像德里达说的，形而上学是一幅白色的（或不可见的）神话，它用绝对肯定或否定的概念抹平了硬币上的头像——智慧的本来形状。

以上，我们实际已经尝试划出智慧的形状，就是那些鬼神莫测的道道、线条、流，一些异形或岔路。与逻辑范畴的推演不同，中国古代依照智慧的形状（比如卦象）占卜事物，这又是抵制分析的：一望便知，可意会而难言传，无须唠

的分解、叠加语言的皱褶(我们看到古代智慧与大道对应的是箴言,《老子》仅五千字)。范畴的推演意在说智慧的进步,智慧形状却意在智慧的变化,而变化并非进步。

象形文字画出了智慧的形状——圆滑,“圆”与“滑”都是形状,不能牢靠地沾在某一个固定的点或立场上,居中而又顺其自然。极聪明者道中庸,没有立场者可以有所有立场,引而不发,伺机而动,又没有一神论者的痛苦。圆滑乃周,为“动摇者”的智慧,其性格显现为柔或内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第十八),这“异于是”,不做判断的智慧习惯,与叠加判断(是或者非)的实在论传统大相径庭,为智慧形状的两大分支:前者老道,从“一”中引出多;后者真诚,其传统是忏悔。道中庸者的智慧状似老树根,枝条分叉,盘根错节。换句话说,不是一种语言。这样的智慧要到20世纪,特别是其后期,才为西方人渐渐重视,从文学蔓延到哲学:意识流的创作轨迹或诡计,其要害仍在“欲隐而显”,乔伊斯作品之所以难懂,在于他有意利用一字多义或同音多义,像在一幅画上有重重情景,话(画)里有话(画),其意味全靠想象;在普鲁斯特那里,有一条妄想的线,不沿时间顺序的条条岔岔。所有这些,也是欲隐而显的象,说出来,很像谶语,“精神分裂症”的语言,不走正道的“胡说”。在德勒兹那里,同样的情形被描述成一条欲望不断逃脱的线:欲望得不到表达,便有畸形的逃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出口,像极精细的牛角尖,挤压人们进入。这样的智慧形状被判定为异端、精神病,却又绝非精神分析所能解释的,因为后者只给出了一种诠释结构,而欲望的实际形状复杂得无以复加。于是,欲望不断地从它的解释者(或专制者)那里逃脱。

逃脱的线也是迂回的线,各种形式的解释学却只让这些线回到一个中心点上,即形成一个统一的观念,这样的思考习惯竟然让辩证法成为公式。这好比筛掉智慧的形状,筛去混浊,留下清晰,也留下索然无味——因为它只让我们看事物僵死的一面。“面”,也是一个哲学概念,逃逸或迂回的线不断形成一个又一个“面”,或者模样(德里达也曾经谈到“播撒”和“嫁接”)。“面”是“可视”的,有形状;“面”又是被铺开的,借助于相似、类比、隐喻:两个“模样”的连接绝无一定之规,它们之间本无路,所以说,这个过程是创造。它的诡计或轨迹是横着走,导致另一个“面”,并不沿着垂直方向寻找逻各斯,一个一定如此的目的。横截面之间的沟通(像解构,又像莱布尼茨意义上的两个单子之间的交往)是隐而不见的,全靠想象。

“面”,比如立方体的面,就是面,属于现象,不是所谓本质。把立方体展开,是一个更狭长的面,也不是本质。一个面有一个horizon(眼界),连接另一个面的眼界(不同眼界之间界限的解构,使之拓宽,这个连接处是隐蔽的),以至无穷。一个窥视另一个,自己又被他者偷看,这一切都在不察觉之中。“面”不但可以铺开,也可以打折,叠出褶子,这有些像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法:一代又一代学者在文本上做批注,好比不断复制同一盘录象带,千百年的批注过去,原样已面目全非。批注和horizon一样,都处在边缘,在空白处书写:接着说那些没被提到的(方)面。

智慧的过程或者形状(离智慧最近的元素)比智慧的目的或观念、立场本身(离智慧最远的元素)更重要,但哲学通常只看重后者,前者却隐藏着、绕弯子。海德格尔晚年写《林中路》,寻找荆棘中归隐的路迹,那路是弯曲的幽径,不是阳光大道。“大路”应该是being,存在的本体论,被海氏划上了叉叉,以示决裂。海氏的前驱是赫拉克利特,正是后者说“事物喜欢躲藏起来”,那里也有智慧的原形。但它不是being的传统。

智慧的形象被哲学筛掉了,成为“剩余”。这剩余的因素在表面的文本、文字、图画、话语之外,中国智慧对此有最生动的描述,称其为“味儿”:在表面的道道之外的东西,难以表达的东西。用西方哲学概念,“味儿”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谓“事物喜欢躲藏起来”,相似于所谓“内在”——这个不可言传、难以看见的东西有它的“形状”!内在即隐,欲隐而显的智慧容貌是让人震惊的,庄子《应帝王》中的壶子让一个所谓的神巫相面,壶子的面相每次都不相同。神巫只凭壶子显露的容貌,先对壶子的弟子列子说,你师傅要死了,殊不知壶子将内在生机藏而不露;壶子稍显生机,神巫又说有救了;待到壶子显示阴阳二气调和之状,平和而不动声色,似深邃之渊,结果只演示“渊状”(虚无之态)的九分之三,神巫就吓跑了,这是“内在”流的威力:“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守阴而非阳),大白(纯洁)若辱(辱:黑色)……质真若渝(渝:无常、变化),大方无隅(隅:棱角),大器晚成,大音稀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第41章)又“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45章)所有这些,也可称为“内在的面”,为“虚”,不可听,不可视,说不出者,因为它并不对应一个世俗的形象。

“内在的面”是一个模糊的画面,与它对应,“大辩若讷”,语言的本色就是结巴的,不是笛卡尔式的清楚明白。同理,思想和画面也是“结巴”的。结巴或不连贯,因为语言、思想、画面中有太多的岔路——其中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并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岔路也是可能性,总是有剩余的可能性。

概念只是一个点,是思考的结果,但智慧的形状,或概念形成的过程却可能并不借助于概念:无概念思维,前哲学的思维,其中的智慧并不比哲学少,其中“内在的面”还呈混浊状,没有用概念的筛子过滤。不依靠概念:逍遥游、放任内在。逍遥者,行而无所恃也,甚至不借助助力的力量。忘记任何前提,故无我、无功名。逍遥者,“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庄子,逍遥游)默然俗世“真”与“假”、“善”与“恶”的差别。所谓清晰,乃在于区别,或分析;所谓晦涩,乃在于混浊,无可不可,多重镜像,有如马拉美的诗,放任不确定的内在。又像于连所言:“拯救话语的首要方式来自不确定性,不再指称什么东西,一味蔓延消遣至极端,导致放任。”(于连,1998年,第205页)结果,又是哲学意义上的结结巴巴。“结巴”的内容比好口才更丰富,因为结巴缘于想说几种语言。

“智慧话语的形状是扁平的……换句话说,它的缄默就是它的话语,这时,它放任内在性。”(于连,1998年,第206页)扁平、没有“骨气”、不坦率、圆滑。沉默比结巴更甚,因为更说不出。于是,不靠词说话,而靠模样(表情、暗示等等)说话,像上例中壶子渊状的情态。“渊”像似漩涡中的黑洞,冒不出一个清晰的意义让话语言说,而一旦能说清,支吾或结巴、暗示之类也就散去了。

如果哲学仍旧自信是热爱智慧之学,也应该包括爱智慧的形状。于是,关于“什么是哲学”就有以下新的思考:

哲学家们通常只是从事(学习、研究)哲学,而极少问哲学究竟是如何生成的?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古代智慧(特别是老庄)和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古代的与当代的智慧竟然“不谋而合”:一个说,有生于无;一个说,哲学概念来自于发明,哲学就是创造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以上反复提到的德勒兹,他在《什么是哲学》中这样说:

“哲学是形成和发明的艺术,是制造概念的艺术……来自东方的古老智慧也许靠形状思考,而哲学家发明和思考概念。”(德勒兹,1991年,第8页)于是,两者的区别是形状和概念的区别。概念成为哲学家的“目的”,但形成概念却是一个过程,一个充满“形状”的过程——这是德勒兹论述的重点,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哲学家之处。换句话说,没有概念,哲学(家)就无法成活,一个哲学家,就是一个概念化的人格: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或超人、弗洛伊德的俄底浦斯情结,如此等等。所谓“创造概念”,亦是创造出这样一个智慧的人格。但是,“创造”强调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似乎应属于前哲学状态,可这正是德勒兹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创造概念的过程也是哲学本身,“前哲学”即哲学。智慧应该习惯于在“没有概念”的黑暗中摸索:心神不定、放任自己、智慧的形状像一连串危险的高难动作。

“概念的轮廓是不规则的，是由它内在因素的数量加以说明的。这就是为什么从柏拉图到柏格森，人们总是重新发现概念似关节、切分、交叉。因为概念总是把它的成分加起来，概念是一个总和，但是一个片段的总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概念才走出思考的混浊状态。”（德勒兹，1991年，第21页）如果说概念是哲学智慧的结晶，那么德勒兹这里描绘了概念的形状：它孕育在思考的混沌状态。概念的形状和我们以上所谓智慧的形状有什么区别呢？它们在不同的内在（层）面上，后者是模糊的，前者是“清晰的”。但两者又是相似的，因为概念也分叉、有岔路，也交叉，有迷惑的十字路口，在那里选择的路不啻创造，因为不走老路。

德勒兹理解的概念又不似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理念：“概念述说事件，不是本质或事物。这是一个纯粹的事件……他的事件，或者说，面孔的事件（这时面孔反过来作为概念被把握）。”（德勒兹，1991年，第26页）概念有自己的“面孔”！比如鸟的“面孔”是“飞”，这时，我们想到的不是鸟，而是飞，从而概念有了形状——这与黑格尔式的概念截然不同。“飞”有速度和轨迹，是一个过程，是它的轮廓和踪迹。创造概念不啻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在一个方向（或方面）凝聚力量和能量，成长壮大，删增自己的成分，以至终于凝结为一个点，这就是概念。至于另一个方向的概念是什么，是否与其相符，是无关紧要的。概念的十字路口，岔路口，形象地说明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离异关系。每个概念都有自己的面孔，就像莱布尼茨说过的单子模样——单子的面孔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在面”：如果从概念看这个单子，它是哲学的；从情感上看，就是文学艺术的。

于是，在德勒兹看来，概念并不“抽象”，它是有“面孔”（作为“事件”的面孔）的观念形态，而不同于一个科学命题：命题是科学的对象，有一个外在的所指；而概念只描述自己的“面孔”或“事件”，是一个“内在的面”，衡量它的标准不是看它是否与外物符合，而是它自己创生和变化的强度——这个强度是否能构成一个事件。笛卡尔的“我思”就是他创造的“内在的面”：他放弃外于“我思”的一切对象，消除了主-客体的对立。于是“我思，故我在”成为被创造出来的第一概念或哲学，它孕育于哲学之前的理解，因为它首先在没有概念的黑暗中摸索，弯曲迂回，没有指望从前的概念。笛卡尔的沉思自己跳舞，连接着一个又一个惊险的高难动作，像面对“无”的“飞”。真正的哲学家不屑于争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同伴在另一“内在面”上跳舞，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不是一样的事件。所谓批判的效应：一个哲学概念可以消失，但它从来没有被征服。哲学不说一种语言，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新环境，比如，康德在“我思”中加进了“时间因素”（我思的先天形式），模样大变：有了新的时间、空间、质料，总之，新的事件。创造一个概念，也就创造一个事件，一个从来没有的体验：体验不仅是被动地感受出来的，更是创造出来的，靠想象——飞起来的生活。笛卡尔和康德各有自己的眼界：一座平台、或高原，一个有浓淡差别的“内在面”。

“内在面”不等同于概念：它铺开成为一个过程，它收缩才形成概念。“内在面”的过程也是哲学创造过程，一个非正常的精神生活过程：笛卡尔沉思中想象自己四肢不全，甚至有一个玻璃的身体，有犯罪的思想。就正常的精神生活而言，笛卡尔的想法过度、超出、有过多的剩余——钻牛角尖，精神障碍者的显著特征：一个极细小而可以忽略不计的琐碎念头足以造成终生的痛苦，而俗人功利性的大事却可以忽略不计。大智若愚，傻子就是天才。天才的特征就是在一个“内在面”上放任念头，使之过度，凝神陶醉，善于异形，或曰解构，有如庄子早上醒来，怀疑自己乃蝴蝶之梦。痛苦在于将现实中绝无联系或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对接一起（究竟哪些因素相互连接，是绝对出人意料的，到处有不可能的可能性。精神病总和天才在一起，这是痛苦，也是陶醉），并恐怖其结果，所以多余的念头一定是混浊或解构的念头，被神秘性强烈吸引的念头，生出的畸形就是所谓创造。创造过程就是使这些混杂的因素过筛子，以使无序变有序，留下一些概念。

创造概念就是创造新的体验：“有许多哲学书，我们不能说它是错的，因为它们实际上什么也没说；我对这些书不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创造任何概念，不带有任何思想形象……概念应该仿照它们活生生的质料，有一些不规则的形状”（德勒兹，1991年，第80页）。德勒兹极力使概念或哲学形象化，既然概念像单子一样是各个特殊的，那么，它们之间就没有逻辑上的等同：“概念的规则就是内在与外在的邻近性……其相邻是从难以察觉地带着诸多毗邻因素中得到的。”（德勒兹，1991年，第82页）邻近，就是我们以上所谓的“横着走”，其创作手法类似于中国传统中的“比”与“兴”。在诸多因素之间，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外形上的邻近，都可能搭起一座由此及彼的“桥”，使不同的精神因素“神似”，不同的外形“形似”。“相邻性”是一种发散的思维，不是指向一个点或一个中心，一个意义，而是一群或一片相近似的意义，因此又是模糊的，在模糊中摸索，在摸索中创造。

“中国的思想就是在平面上往返，自然思想的曲波浪线的运动，阴与阳、卦象就是这个平面的形状。”（德勒兹，1991年，第88页）这些形状充当了西方哲学中“概念”的职能，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对中国智慧的形状感兴趣，原来是因为他创造的概念也是有形状的。

## 参考文献

-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法）吉尔·德勒兹 著，刘汉全 译，2000年，商务印书馆。  
《迂回与进入》，（法）弗朗索瓦·于连 著，杜小真 译，1998年，北京三联书店。  
《论语》，程昌明 译注，1999年，山西古籍出版社。  
《老子·庄子》（上、下），2001年，时代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直解》，199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

François Jullien, 1998, un sage est sans idée ou l'autre de la philosophie, Seuil.  
Gilles Deleuze et Felix Guattari, 1991,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Minuit.

[回主页](#)